

“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初论

任全胜¹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 100871, Email: qsren@pku.edu.cn)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求一个符合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特点的东方知识体系,但至今它仍然是缺失的,制约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本文分析了其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中国学术界必须经历一个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历程,即立足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以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各学科共通的学术母体出发,将整个现代学术的文明移植到中国文化传统之根上,进而开展一系列宏大的论述。本文论述了“太极”恰可作为这一学术母体的象征符号,代表了中国的自然哲学体系,由此“启动太极”,开展东方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方可诠释“全从太极:一切人文肇自太极”,并能促使人类从“物质的文化”转向“生命的文化”,并进入“自然的文化”与“心灵的文化”。今日中国之大学已沦为西学的附庸,且日益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尚难担当这一“移山倒海般的大业”,本文最后提出了当下可行的方案,以促进一个东方式的学术共同体的诞生。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东方知识体系;中国自然哲学;科学革命;文化革命

一、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缺失

中国进入20世纪后,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在西方的坚船利炮和现代文明双重冲击下,中华民族开始“救亡图存”并经历了诸多痛苦的历史转折,时至今日才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渐次开启民族复兴的篇章。在历史的三峡中,中国人传统的心态、生活、文化、学术,也经受了种种冲击而濒临毁灭,在一些贤人志士的坚守与变革后,才得以命悬一线、置之死地而复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在痛苦中积极地学习、理解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开启了东西方文明的融合进程,并不断求索着自己的现代文明之路。

自洋务运动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而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再到社会主义运动引入中国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泛滥于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选票政治,中国人一直在寻求一个符合新时代特点的现代知识体系[1]。然而,时至今日,这个知识体系仍然是缺失的,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自然科学领域均是如此,这极大地制约着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

¹ 联系人:任全胜,男,34岁,副教授,理学博士, renqs@126.com, 010-62745290

（一）社会科学方面

新加坡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无论是“左”是“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知识分子，“整个知识群体长期处于思想被殖民的状态”[1]，丢失了自己文化传统的根本。举凡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都统统是西学的天下，没有立足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它们“既不能解释中国，也和中国的实践不相关，但它们在中国竞争，竞争对政策和社会的影响”[1]。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对西方社会及近现代历史的了解仍极其肤浅，可谓“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很天真”）。例如，中国人自“睁眼看世界”以来近 200 年后，中国政治学者才开始理解共济会及其在英美社会和近现代史中所起的核心作用[2]。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高鹏程老师对共济会是这样定义的[2]：“一，共济会组织是由‘光荣革命’第二代建立起来的全球跨国组织；二，共济会组织是由世袭贵族、社会贵族、知识分子、宗教神职人员、金融工业资本家组成的兄弟会团体；三，共济会组织是以‘非有神论’的最高存在为信仰的感性主义道德教育为手段的义务性组织；四，共济会组织是对英美社会具有广泛干涉性的、具有建国党性质的整体性政党；五，共济会组织是近现代最早推行法治宪政的综合性社会组织。”可以说，不懂共济会就难以深入社会科学各领域，以及人文科学中牵涉社会科学问题的部分。例如，共济会“采取象征主义(Symbolism)进行思想观念的传播”，从而形成共济会构造的具有排他性、多义性的语言。“在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中，有很多这样的象征符号式的概念，例如利维坦(Leviathan)、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以及三权分立等，学术界对这些象征符号都进行了过度的、自作多情的解释。”“‘看不见的手’的含义不是什么自由的市场机制，其本义就是‘上帝之手’，……其衍生意义是资本在背后的操纵；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由三种权力构成的三角形，在共济会的象征符号语言中，三角形被认为是‘上帝的居所’，即那在三角形中的独眼，它代表着如上帝般的资本，这在美国国徽中可以看到。”[2]以太极之理言之，英、美可谓是太阳太阴，大众选举是阳，资本控制是阴，两党选举如身体，共济会礼制如灵魂，虚实统一，阴阳和谐；而自由经济和选票政治就是共济会对内、对外的理论武器，为资本对内、对外的操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只学得表面文章，没有科学复杂的精英逐级培养和遴选机制，没有对资本的控制及资本的社会控制等体制，便很难逃脱被共济会和国际资本控制的命运，最终社会、经济秩序趋于混乱，任由西方资本去洗劫发展的果实。

（二）自然科学方面

种种迹象表明，相较于历史上德意志与美利坚民族的科学时代，中国科学界的文化主体意识仍未觉醒，具有鲜明民族禀赋的科学精神仍未形成。无可否认，中国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主流是跟得越来越紧了，但也视西方的“主流”为“唯一”准确的方向，——除了本土经验外，在西方不属主流的科学新动向，也在不被关注之列。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现代科学要与东方文化合流的提议往往被视为空话、民科乃至伪科学，更罕有人能够深刻意识到科学现状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危机。具体而言，与物质世界基本法则直接相关的科学分支是理论物理学。在经历了 300 多年的迅速发展后，自 1980 年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提出、宇宙暴涨的发现以来，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已停滞了 30 余年。理论物理学要继续向前发展，必

须要解决统一广义相对论与量子理论等五大问题[3]。然而，即使这些问题都能解决，又于事何补？194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即早已指出：“听起来也许奇怪，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物理学与我自身的疏远。”[4]这句话揭示了物理学一个深层次矛盾——在现代物理学理论里，并没有给出我们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所处的位置[5]。现在国际第一流科学家多在研究生命的奥秘。此处，生命科学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现有的生物学内容，也包括大脑意识与生命终极实体(ultimate reality)的问题，而科学有关这方面的了解还极为肤浅，毕竟，它对物质世界的了解也只局限在“经验”所能触及的那4%（其他为所谓的暗物质与暗能量）。东西方文明曾按照各自不同的轨迹发展而来，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全然不同。古代东方的华夏民族与印度民族具有与西方各民族全然的思维特点与文化习惯，其后古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亦传入了中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格物致知”的领域，中国人曾经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理论体系与世界观。当代科学已经开始关注生命与终极实体的问题，这意味着科学将向非实体性与整体性方向发展，传统物质实验已面临一些瓶颈，再进一步便涉及到“真空”深层次的丰富结构，未来必须以中国的自然哲学为导向。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科学与中国哲学合流的新世纪，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对自己哲学传统的了解已所知甚少，社会的主流世界观已全然是泛科学主义与物质化的了。

（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两千五百年前，六艺²与五明³在孔学与佛学中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但现代大学却忽视了全面素养的培养。在当代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基本上是脱节的，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不懂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人文或社会科学的人对自然科学和新技术的发展大多也一窍不通。“在较长时期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科学发展、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却都需要各门类科学、各门学科之间交叉、渗透和融合。”[6]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仍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西方学术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对话早已开始。例如，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于1975年在其名著《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探讨了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的关系，得出“近代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思想惊人地相似”的结论，并认为这种宇宙观的变化今后势必影响许多学科的发展，改变人类命运的进程[7]。他还于1982年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这本书中，揭示了笛卡尔-牛顿规范中的分割的、还原的方法对近代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带来的局限与危机，指出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难统统来自于那些导致近几百年来人类迅速进步的西方科学文化[8]。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与新兴技术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的时代背景，社会科学如果忽视了它们，又怎能指导今日的社会实践呢？例如，今日的网络与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飞速发展，这必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日前，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 Erik Brynjolfsson、麻省理工

² 中国古代儒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³ “明”谓学问、学科，五明为五门学科，概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体系，为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

学院首席科学家 Andrew McAfee 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Michael Spence 的一篇文章，他们展望了新兴信息技术所开辟的社会前景和带来的社会问题，认为在“第二个机器时代”，劳动力和资本似乎即将失去往日的辉煌，观念将是更稀缺的生产要素，只有那些能够提供好创意的少数人才将会获得巨大回报[9]。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将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作为最重要的时代背景加以考虑，则其发展必将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相脱节。

（四）西方知识体系深受“还原论”与“二元论”的局限，亟待借鉴东方智慧，然而中国的大学教育却缺失了东方式文化传统的传授。

三百年来，科学的发展使西方文明的理性精神大放异彩。而人类社会步入 21 世纪后，浮现出了迫切需要解决的四大时代课题，即生态维护、人类身心自我免疫、生命如何共同进化、人类的生命起源与尊严等[10]。这些问题的产生，与西方文明和现代科学的两大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即重视局部分析而忽视整体的“还原论”，和认识主体与客体及物质与精神相割裂的“二元论”。西方哲学传统中的还原论与二元论已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再往前发展，必须重视系统的整体性和自组织性，这种思维模式正与东方哲学传统是一致的。正如研究自组织问题的先驱、1977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Prigogine（普利高津）所说[5]，“我们愈益接近两种文化传统的交汇点”，“必须保留已证明相当成功的西方科学的分析观点，同时必须重新表述把自然的自发性和创造性囊括在内的自然法则”。

当现代科学越来越接近中国哲学的今天，东方的文化体系与世界观很可能为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提示前行的方向。按照中国传统，天人合一于自然里，自然是天地万物间自发的和谐，“道法自然”。举凡易学、医学、艺术、伦理、政治等，无不强调整体性与和谐，对整体性与自组织性的重视，体现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更进一步，在中国哲学中，也并不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二元性的矛盾，如王阳明所道出的“心外无物”，在阳明先生的眼里，心与物本为一体，其关键在“感应之几”。《周易·系辞》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大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学科已不再教授东方的哲学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更罕有涉及“静修格物、感通天下”的生命实践。

（五）文化主体意识尚未觉醒，学科之间尚无共通的学术母体，缺失了“宏大的叙事”阶段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存在的这些尖锐问题表明，中国学术界的文化主体意识尚未觉醒，所研究的学术并未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而文化主体性的失落，则意味着国家历史的中断、民族精神和传统的丧失。只有坚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才能理智地、有针对性地吸收西学等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来充实、丰富自己；而如果丢失了民族立身的根本，盲目地学习西方，便有可能给民族发展带来负面乃至毁灭性的影响。

在当代的各个领域，“不论问题的启动、演变或解答，多是由西方国家带动讨论和制定标准，亚洲大多时候只能遵循和采纳”[11]。中国主流学术界仍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只研究西方人所提出、发展的方向和问题。相反，20 世纪西方诸多大科学家却早已指出，东方传统文化中保存有“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

分意义上的科学”，“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12]，并由此探索“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7]，——这些极富远见的论述与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学术界必然要经历一个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对教条主义（一切从西方既有学说命题、定义公式出发，不从本民族的观察与经验出发）的摒弃和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13]，而这与科学精神是根本一致的。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各个学科都直接引入自西方学术。这些学科的发展史都可追溯至共同的本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猛老师称之为“学术母体”[14]。中国的学者和学生由于专业化压力很大，“很少会真正去接触这些本原的思想”，例如，“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不仅不读柏拉图，也不会去读帕斯卡、莱布尼兹这些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家的著作”[15]。而且，由于这些学科的学术母体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传统的烙印，与中国人及其文化传统天然地隔了一层，使得中国学者更难于把握这些学科背后相通的灵魂。这导致了中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所有学科的共同的学术母体实际上是缺失的，甚至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科彼此也无法沟通[15]。在现代学术面前，中国人面对着“学而不通”的尴尬。

香港的科学史学者陈方正教授认为，“吸收、发展科学，其实相当于一整个文明之移植，是移山倒海那样的大业”[16]，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社会科学。中国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实际上是要完成一个“移山倒海那样的大业”，将整个现代学术的文明移植到中国文化传统之“根”上，从中国哲学中找寻共同的学术母体，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由此而诞生的一整套文化体系，其灵魂核心应直接继承自中国文化的道统，其内容应涵盖科学、人文、经济、政治等人类文明的诸多方面，它将对中国文化道统中的相关学理进行再发掘再诠释，进而与启蒙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以来的西方优秀文化遗产相契合与交融，并最终超越它们，为人类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理论范式，为人类开辟出新的文明气象。

然而，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便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如救头燃的大事，而到了 21 世纪中国具备了一些实力后，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方面和欧美等先进国家竞争更成了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这导致了自五四时代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便太注重实用和当前的效果，努力拥抱西方的知识体系，而放弃了前述这样一个宏大叙事。郑永年教授对此有过深刻的剖析，兹引述如下[17]：

“西方的知识体系自 16 世纪之后开始得到发展，在 18、19 世纪得到长足的进步，到 20 世纪初基本完成。这个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的论述’基础之上的，诸如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宏大的论述’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今天，社会科学，尤其是美国，已经转移到微观研究。欧洲还继续有“宏大的论述”的传统，当代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仍然出自欧洲社会科学家。但美国的研究主要转向了微观。微观研究是美国人的优势。……当代美国社会科学本来就是欧洲移民建立的，他们没有任何困难，把欧洲的知识体系移到美国。如果用学术化一些的语言来说，欧洲人建立假设，美国人来检验。这种分工和合作，一直相当有效。”（笔者认为自然科学也同样如是。科学中心自转移到美国以来，愈发地微观化，已缺少当初在欧洲时牛顿、莱布尼兹、希尔伯特、达尔文、爱因斯坦、荣格等所主导的那种“宏大的论述”！）

“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榧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苹果’。上面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的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等高度制度化了。这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很难克服。”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很难想象一个强调力量而忽略沉思的民族会真正复兴，并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方向。然而，面对这样的因循、矛盾与彷徨，这“移山倒海般的大业”又如之何？

二、东方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

构建东方知识体系，首先要探寻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那个首要原型⁴，以之作为各学科之间共通的学术母体。笔者认为一个最自然的选择，便是以“太极”作为未来东方知识体系的学术母体。为了由此而展开东方知识体系的宏大叙事，我们必须先界定清楚“太极”是什么，并明确其与现代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在台北艺术大学美学教授张清治先生所概括的“启动太极的原义”中，是以太极拳为例来说明的：“启动太极的精神是建构在道统文化的基础上，太极拳原是本乎阴阳为体虚实为用的理念，进而实践那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而要想说清楚张清治先生所言的“全从太极：一切人文肇自太极”，我们还必须探寻“太极”更本质、更丰富、更系统化的内涵。在中国哲学中，“太极”自有其传统的定义，但此处笔者更想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界定“太极”和“启动太极”。

（一）总论：“太极”是中国自然哲学体系的代名词，“启动太极”代表了东方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

广义上，“太极”可作为东方古老文化传统的象征符号，代表了“中国自然哲学体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已故数学教授牛实为先生将中国的自然哲学体系概括为“中华文化的四大支柱，及其上的一盏明灯”[19-23]，并系统地论述了它们和现代科学的关系，使得这种哲学体系的表述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某家某派的哲学，而升华为中国的“自然哲学”。

● 中华文化中作为中流砥柱的四大理论体系分别为：

- 易经的系统观（儒家文化亦归于此，涉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台湾日月书院的马叔礼先生从基本的几大对称性出发揭示了《易经》六十四卦之间大、中、小结构环环相扣、相互印证的大自然哲理[24]。因此《易经》实际上具备了普遍的系统观意义，可涵盖生态系统、五脏六腑、神经系统、人性伦理、社会政治，乃至基因密码与原子核内部系统等[19]。人类要探索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模式，离不开系统观的思维。
- 内经的生态观。天地人三才，人居其一，为万物之灵。《黄帝内经》涉及

⁴ “集体潜意识”与“原型”涉及荣格心理学的最核心部分，参见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18]。

宇宙空间影响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五运六气”的外环境与人体“五脏六腑”的内环境，由此揭示出人的内环境随外环境而变化、内环境基于功能态的体系划分与相互作用，以及疾病的发生机理与防治方法。[20]

- 道德经的自然观。《道德经》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此形成易经的系统观；以人而言，外环境与内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内经的生态观。《道德经》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为万物之灵，可观天俯地；道生万物，微兮妙兮，不修德就不能证道。“夫大人者”，观察天地变化规律，由此而“治国安民”，使社会和谐、共同进化。《道德经》又言“死而不亡者寿”，肉体死了，但仍有寿而不亡者，这就牵涉到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命尊严。要实证此生命尊严，就要“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常是无量寿，明是无量光，从而达至华严经的真空观。可见，道德经的自然观涉及从此岸通向彼岸的桥梁。[21]

- 华严经的真空观。“今天的科学研究指出：真空并非一无所有，而是最低的能量态：它是电磁场的基底，电子散射时从真空汇出即生即灭的光子；从‘终极实体’来说，最小的粒子都从真空产生。此外，美国科学专题作家 John Horgan 于 1992 年 7 月在《Scientific American（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Quantum philosophy（量子哲学）》一文，提出心灵光子（psychic photons）[25]：人脑细胞内的真空态潜在有‘心灵光子’，由此呈现千万类型的心灵光波，传播不可思议的信息。这也就涉及到‘真空非空’的实际情况。”“从华严经来看，悲智双运是长时间修证的结果。此状态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寂照同时，止观双运；是无量光、无量寿的‘自性真空’；它既超越物理真空与生物真空，却又未离三界众生。这也就涉及到华严经的真空非空境界。”[22]

- “自性光明”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来传承的一盏明灯。[23]（涉及张清治先生所言“怀抱太极：神驰天外，抱元守一。”）

在这个视角下，“启动太极”恰可作为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的代名词，我们要遵从易经“时变”的精神，与“时”俱进，结合当代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卦”、“爻”）去启动古老的智慧。具体而言，即从中国的自然哲学体系出发，在这一“自然”的、“形而上”的观念层次上去理解西学中的现代学术，并结合中国人特有的生命体验和社会发展经验，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革命性重建，在更高的境界上重塑现代文明。从而让“太极（古老的东方智慧）”在现代社会缘起而顺生，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由此“汤武革命”，来为全球化的新文明建设贡献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力量。

（二）自然科学方面：“太极”是宇宙、生命终极实体的四个层面之一，即“自然真空”，填补了主客二元间的鸿沟，是科学由此岸通向彼岸的一座桥梁。“启动太极”涉及由“人”而“文”的密意，代表了人文主义之科学。

狭义上，“太极”可作为宇宙、生命终极实体的一个层面。这里，“终极实体”是英文 ultimate reality 的意译，而牛实为先生给出了一个更准确的定义，即“自然的本性是真空”，“真空妙有”，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层面或属性，即“物理

真空”、“生命真空”、“自然真空”、“自性真空”。笔者进一步结合当代科学的发展对真空的四大层次结构给以了界定：

- **物理真空**。对应于传统物理学所描述的真空，物质满足牛顿力学或量子力学所描述的运动轨迹或波函数，它们遵从确定性的运动方程，时间是可逆的。
- **生命真空**。对应于感情意志等生命能动性层面，与非平衡态物理学有关。时间是不可逆的，过去和未来不再扮演对称的角色，生命的主观能动性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有关生命意义的真空存在，在东方的生命经验与经典学说中有诸多描述，在西方超心理学等现象中也有很多相关经验⁵。
- **自然真空**。物理真空和生命真空都是这个世界的不同侧面，对应于物质与精神，未来的新物理学应该能把物理真空与生命真空统一在一起。这更深一层的真空称为自然真空，它填补了主客二元间的鸿沟。所谓自然，在东方文化的语意系统里有“天然”、“自然而然”之意，天人合一于自然里，自然是天地万物间自发的和谐。自然真空实际上已经在科学的最新进展中有所体现，比如 Prigogine 的新物理学架构[27]、Bohm 的隐秩序物理学理论[28]和全息图宇宙(Holographic Universe)理论[29]、Smolin 有关时空结构的关系化秩序理论[3]，它们共同指向了这样一个空间的存在。
- **自性真空**。自性真空来源于佛学的语境，如来智慧德相从表像说，涉及自性光明；从实体上说，来源于“自性真空”。“自性真空”具备如来藏的功能，且能够显现自性光明，这种光明具有“灵明洞彻、湛寂常恒、非浊非清、无背无向，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的境界。

这四大真空与前述中国自然哲学中的四大理论体系分别对应，而狭义的“太极”正对应于“自然真空”，来源于道德经的自然观。将四大真空在理论上统一起来，揭示出“生命科学的终极实体”，就是新物理学要面对的任务。未来的物理学，已不再是“物理”之科学，而可称为“心物理学”⁶，将涉及到生命与灵魂最本质的内涵及其与物理过程的关系，如周敦颐所言“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这涉及了由“人”而“文”的密意，彰显了“人文”的本意，是为人文主义之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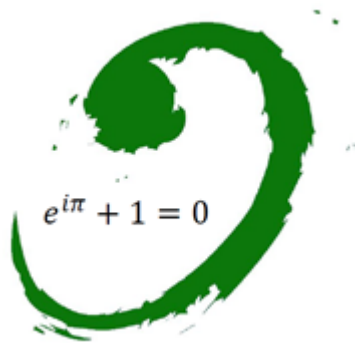


图 1 “启动太极”人文主义科学徽标

⁵ 有关超心理学与真空及物理学革命的关系，详见美国 MIT 大学物理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 Claude Swanson 先生的五卷专著，其中两卷已出版 [26]。

⁶ 心物理学，即“心”－“物”－“理学”，与前述王阳明先生的“心外无物”、“感应之几”相契合。

(背景为北京大学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学院太极武艺学会理事长林添进先生所创发之启动太极标志)

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从人文主义科学的角度，对“启动太极”做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图1所示为**人文主义科学的徽标**，其核心为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数学公式——欧拉公式。它以如此简洁的形式，把数学中最基本而关键的五个数：0，1， i （虚数单位）， e （自然指数之基）， π （圆周率），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出来，其中 e 与 π 为最首要的两个超越数（无法用整系数代数方程表达）。利用高中数学有关三角函数的知识，可简单理解为 $e^{i\pi} = \cos(\pi) + i \sin(\pi) = -1 + 0$ ，所以 $e^{i\pi} + 1 = 0$ 。

这个公式蕴含了从无极到太极再到阴阳的关系：

- **无极为0（自性真空）。**
- **太极为1（自然真空），**可以理解为归一化的系综概率密度函数（**感应之几**），以自然指数（ e^{ikx} ）的形式进行傅立叶展开，Prigogine 由此给出了经典力学、量子力学与统计物理学的统一范式[27]。
 - e^{ix} 描述了由一个基点出发生出的单位圆运动轨迹（如林添进先生所创发之启动太极标志所示）。
 - e^{iat} 描述了系统沿时间的演化。
- **阴阳（ $e^{ix} = \cos(x) + i \sin(x)$ ）**为合抱的虚数（ $i \sin(x)$ ，阳）与实数（ $\cos(x)$ ，阴），两者相对安立、相互转化，孤阳不生、独阴不长。
 - 阳对应于生命的空间与文化（**生命真空**）。
 - 阴对应于物质的空间与文化（**物理真空**）。
- **“启动太极”之意为：**
 - 灵明可由自然真空，以天地万物间自发的“和谐”，涌现到生命的空间与物质的空间，从而有了演化与时间等现象，与易经相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是为“启动”的意义之一（“太极”为起点），为“启动太极”所表达的**第一个内涵**。
 - 从0怎么涌现到1，从1怎么回归到0，与佛学的“缘起性空”有关，——“无极生太极”，是为“启动”的意义之二（“太极”为结果），为“启动太极”所表达的**第二个内涵**。

上述“启动”的双重内涵，与台湾大华严寺海云继梦法师在《华严经枢纽》中所述华严经本体论及“双回向”[30]、海德格尔之“存在论”[31]等不谋而合，可见佛学、哲学与科学终将“万法归一”，皆为源自“本体”⁷的自性庄严故！

兹摘录海云法师《华严经枢纽》[30]中的相关论述如下，或有助于对前述内容的理解：

- 《易经》的本体论是从“无极”谈起，“无极”乃真理与生命的本然状态，此存在之本然状态，至真至纯，无可名状，不可形容，乃各种缘起之所呈现，不可一之，不可异之。然约大体而论，“无极”为《易经》本体论之终极定义，似亦可与华严本体论之“性起法界”并论矣！如五祖宗密于《圆觉经大疏释义钞》云：“修成之时，还成本道，故道经云：‘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复归于无极。’此如佛教中，反本还源，为究竟果。”若由斯定义，则“无极”即具有“本体心”、“本体性”与“本体念”之体、相、用的生命本质；而“太极”则是此无形无相之“形而上”的本体，转化为“形而下”具相化之本体，佛家称此为“本初佛”、“原始佛”或“普贤王如来”，华严称其为“普贤菩萨”。实则“太极”亦非眼能见、耳能闻、意能思者，虽云具相化之本体，若非根器利落之大士（如《十定品》中之普眼菩萨者），可仍是杳然无踪，因此通常以一大圆示之；若约“无极”，则空无所示也！
- “无极而太极”之命题中，“而”字即具“双回向”义。一者、所谓“上回向”，即“由因向果——太极如何返源至无极”之命题；二者，称为“下回向”，则是“由果向因——宇宙起源论与生命起源论”之范畴。又，初会经文中尚有“太极生两仪”之命题，则属“下回向”义，此即缘起而顺生；若欲“上回向”，则众生之觉醒因缘力必须有足够的劲道，始能为之；余者属方法论（即：成佛之道）之范畴，且如第二会《净行品》以降，至第七会《普贤行品》经文所论述者矣！

——由此，世界上最简洁、最美妙的数学公式却可能蕴含了生命与宇宙最深邃的秘密，对“启动太极”的原义赋予了新的意义：启动太极的人文主义科学实践，是建构在道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本乎缘起性空、阴阳为体、虚实为用的理念，以身心修证（内明）及科学理性（因明）的方法，去实证那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与宇宙实相。

（三）社会科学方面：“太极”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系统观、生态观、自然观及人的终极价值观；“启动太极”将由此激发出“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代表了“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

如自然科学一样，中国也需要提出自己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而且这体系必须能够上达自易经、孔子及历朝以来的中国道统，也能够下达现代西方学术的标准与规范。笔者的研究领域不涉及社会科学，这里仅从一个自然科学研究者的视角来做初步的探讨。

现代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都存在两个普遍的问题。其一，这些学科无不具有西

⁷ 或曰“无极”、牛实为先生所言“自性真空”、海德格尔所言之“存在（Sein）”等。

方文化中还原论和二元对立哲学观的烙印。以经济学为例，卡普拉认为，“经济学家一般都没能认识到经济只是一个整体的生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是一个由人类相互之间、人类与自然资源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生命有机体”，“社会科学研究所犯的根本错误是把这个组织分割成碎片，设想它们都是独立的，因此要采用各自独立的学术部门来加以研究”[8]。其二，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忽视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及其文化背景。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将决定其世界图景和宗教制度、科学事业和技术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格局”[8]。现代社会科学这两个问题或许能为我们建构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一些思路。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张龔老师认为，在法学中的自然法方面，西方所谓的“自然”不同于我们的“自然”。如前所述，在中国的自然哲学体系中包含四个不同的层次，即自性、自然、生命、物质。天人合一于自然里，自然是天地万物间自发的和谐，这种对整体性与自组织性的重视，体现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何重塑中国的自然之道以及自然法，有赖于对中国自然哲学体系的研究及前述人文主义科学的发展。

再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于洪霞老师认为，西方的管理学、经济学以及民主制度等，无不有深刻的二元哲学观印记，二元哲学观下发展出的价值观，被东方的一元哲学观接受可能性有多大太需要商榷了，这很可能是很多西方之术在中国几乎发挥不了作用的原因。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其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对立，谁也无法代表别人。经济学的基础“理性人假设”，管理学的目标“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些归根结底也都是二元的哲学观。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把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对立起来。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除了有类似对立外，还忽视了人的终极目标，把生存目标与其他目标割裂了，这便涉及了价值观的问题。

基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第一位留学欧美的经济学博士陈焕章先生早在 1910 年即在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⁸[32]中做了深刻的分析，并博得了凯恩斯、熊彼特、马克斯·韦伯等西方社会科学巨匠们的高度评价。他将中国的社会科学思想追溯至《易经·系辞》，提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学（理财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皆以“义”字贯之，并论述了三者之间“理为一贯”的关系：

“理财二字，始于《系辞》：‘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名词既定，界所亦见。盖‘理财’二字，总括生计界。‘正辞’二字，总括伦理界。‘禁民为非’四字，总括政治界。而此三者，皆以义字贯之。但理财之目的在人，所以理财之故，全为聚人，人乃其目的，而理财乃不过其手段。……由《系辞》此条，不独可见理财学之界说，且可见其与他学之关系焉。盖理财所以为人，而人必聚居，故欲理财，必以全社会为目的。此其与社会学之关系也。且也欲理财不可不正辞，则与言语、教育、伦理、宗教诸学有关系矣。欲理财不可不禁民为非，则与政治、法律诸学有关系矣。然生计界、伦理界、政治界三者之中，当以生计为最急，盖苟不能理财，则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礼仪，虽正辞犹无益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民之为非，不能禁也。故明《系辞》之义，不

⁸ 作者认为“economics(经济学)”日本人翻译得不对，“经世济用”在中文中通常意味着政治才能，涵盖了整个政府活动领域，应属于政治学而非经济学。作者认为用“理财”这个古老的术语作为“economics”的对应术语更恰当些。

独可见理财学与他学之关系，且见其居最要之位置。……拙著于理财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之关系，分为三卷，发挥甚详，兹不赘。”

可见，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缺乏系统观、生态观、自然观及人的终极价值观；而这个问题同样也是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大问题，极大地制约着科学的发展！由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建构东方知识体系的理想起点，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观、生态观、自然观及人的终极价值观，它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分科，而成为了一个各学科之范式革命的共同灵魂。它直接上达至中国自然哲学体系的“四大支柱”及“一盏明灯”，又能够下达而触及物理学、生命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立论根本！在未来的东方知识体系中，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竟是“理为一贯”的！

如果只局限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探讨，这或许还会被指为一种学说、一家之言，但未来基于新物理学的科学革命，使得我们的立论逻辑将能够得到新物理学理论及其科学实验的检验，它将以自然科学的强势话语权与影响力，颠覆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他人、自我关系的认识，而为这一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保驾护航。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预言：东方传统文化中保存有“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12]；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进而说，由此可探索“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7]，——信也！

（四）总结：“太极”是未来东方知识体系中各学科之间共同的学术母体，由此，“启动太极”方可诠释“全从太极”、“一切人文肇自太极”。

综上所述，“太极”所代表的中国自然哲学体系可以作为未来东方知识体系中各学科之间共同的学术母体，实现了孔子所言的“吾道一以贯之”。由这个学术母体出发，可以在最高水准上理解西学中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从而在更高的境界上开展范式革命，形成未来东方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之后在与边界条件变化的对待中不断演化，一代代人延续发展而形成体系，——由此，“启动太极”方可诠释“全从太极”、“一切人文肇自太极”。

北大哲学系汤一介教授在去世前曾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类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内心的矛盾。1980年代表人类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成功消灭天花、95岁高龄的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Frank Fenner于2010年指出[33]，人类可能在100年内就会灭绝，包括其它物种也跟着灭绝。他认为，人类进入工业化革命后，对地球的负面影响不亚于冰河时期或彗星撞地球，情况已无法逆转，这是人口大爆炸、无节制的浪费和全球变暖惹的祸。——其实，很多宗教界的智者早已预见到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大危机，并指出它们不会因人类的力量而逆转，除非人类的观念有一个意义深远的改变。在笔者看来，这即意味着经由中国自然哲学体系与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将东方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定位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坐标里，并将人类文明定位在地球生态系统与心灵文化的坐标里，进而定位在宇宙演化与生命尊严的坐标里去观察；促使人类从“物质的文化（科学）”转向“生命的文化（科学）”，并最终进入“自然的文化（科学）”与“心灵的文化（科学）”，从而实践、实证生命在宇宙无常演化过程中的尊严问题。

三、致力于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的生命历程

要完成“启动太极（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这样一个“移山倒海那样的大业”，将整个现代学术的文明移植到中国文化传统之“根”上，以“太极”所代表的中国自然哲学体系作为共同的学术母体进行“宏大的叙事”，理应是当代中国的大学所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今日中国之大学，实际上已沦为西学的附庸。以北京大学为例，它业已丧失了“承太学正统，立大学祖庭”的精神传统：它早已“放弃了北大历史上曾经发挥过的，而且应该继续发挥的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从而使北大愈来愈趋向于工具化和实用化”；“北大的学生总体上则是实用化、工具化教育的必然产物，……多数已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不再有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深入思考，他们可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却不知道北大的传统，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问”[34]。近十多年来，北大等高校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大学改革，但“没有真正学术自主理念支撑的大学改革，既无法光大自己的传统，更无力‘拿来’别人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引导中国大学走上独立成长的道路”[14]。北大尚且如此，其他高校的情况就更不堪入目了。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大学尚难以担当“启动太极”这一历史性重任。

目前，我们奢谈大学改革或许还力不从心，现在能做的或许是基于有志于此的兴趣群体，去致力于促进、营造一个有益于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的学术文化，进而使其自组织式地不断演化，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学术生态。笔者认为，当下可行之事包括：

- 开宗明义，明确“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的内涵、愿景与未来的发展战略。
 - 自我砥砺、彼此加持，蕴育可堪当大任、共襄盛举的人才。这种人才应该具备如下几方面的素养：
 - 以“动”中求“静”为基础的身心实修实证；
 - 中国自然哲学的国学素养；
 - 各自在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诸领域的西学专业素养；
 - 一种全局性的视域。
- 由此，将造就一批东方式的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他们将具有健康的体魄、内在平衡与外在和谐的生活、深厚的哲学基础、清明缜密的思维能力、全局高度的观察视角及与生命修炼相结合的科研历程。
- 以线上、线下学术沙龙为交流平台，共同促成一种全新的东方式的学术文化：
 - “本立而道生”，研学中国自然哲学的四大理论体系，即易经系统观、内经生态观、道德经自然观、华严经真空观，及中华文明千古传承的一盏明灯——自性光明论，所有这些都是源自“本体”的自性庄严！求索自己的本来面目！
 - “睁眼看世界”，保持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演变的清醒认知及新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跟踪观察，以易经“时变”的精神，与“时”俱进，结合当下及未来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卦”、“爻”）去启动古老的智慧。

- “君子不器”，保有对国家命运、人类福祉深切关怀的“士之精神”，以无为法“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对此北大校友魏铮先生于2015年3月9日曾给以精辟概括：“外儒法，内黄老，言之以名，行之以墨，淡利薄名，身躬农耕于乡野，疾风劲草，驰骋兵势于疆场，明阴阳究天地之理，举纵横和宇内之邦，灯下阅小说而自娱，掌上刷微信而同乐。”
- 从这些共同的起点出发开展跨学科式的研讨，研究文化传统的起点不同对西学各学科具体问题的深刻影响，进而探讨如何从东方的起点出发，结合当下与未来的时代背景，用现代学术语言与规范，去探讨一种全新的物理、生命、社会和经济的理论体系，从而投身于“一场真正的世界意义的文化革命”（卡普拉）。

——跨学科的探讨使得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够建立一种真正意义的全局视域，心斋内明的共修、经世济民的共愿、自然哲学的共学、文化志业的共建即是一种共修实践的“结界”、众人精神的“坛城”！

● 机缘具足时，建立全新的学术交流与评价机制：

- 开设“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学术论坛，促进相关学术交流；
- 顺应国际学术出版业的改革浪潮，探索符合“东方知识体系现代建构”需求的学术评价体系，开设两个在线学术刊物，《启动太极——东方知识体系·观察》（文摘、评论）和《启动太极——东方知识体系·学报》（同行评议）。

——由此，一个全新的东方式的学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模式即将诞生！一个共愿、共修、建设、实践的学术共同体呼之欲出！

2015年元月1日初稿

3月11日摘编

致谢：

中国科学院大学已故数学教授牛实为先生逝于2011年3月21日，享年93岁。没有先生的甘为人梯、搭桥指路，便不可能有本文的思考与总结，谨以此文纪念先生逝世四周年。

参考文献：

- [1] 郑永年，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联合早报网，2012.06—2012.07
- [2] 高鹏程，《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东方出版社，2014.4；高鹏程，《共济会核心组织2：双鹰争冠》，东方出版社，2014.12；高鹏程，《共济会核心组织3：圣地权峰》，东

方出版社, 2015.2

[3] L. Smolin, "The trouble with physics, the rise of string theory, the fall of a science, and what comes nex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6.

[4] 汤川秀树着, 周林东译, 《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5] I. Prigogine, "The end of certainty: time, chaos, 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7.

[6] 路甬祥, 科学问题是科学发现的起点, 选自《21世纪100个交叉科学难题》, 科学出版社, 2005

[7] F·卡普拉着, 朱润生译, 《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8] F·卡普拉着, 卫飒英、李四南译, 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

[9] Erik Brynjolfsson, Andrew McAfee, and Michael Spence, "New World Order: Labor, Capital, and Ideas in the Power Law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2014.7-8

[10] 牛实为, “中国文化的四大支柱,” 在共生书院的讲座, 2008.6.29.

[11] 陈迎竹, “赛先生在今天,” 联合早报, 2009.

[12]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卷 5)》, (《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委员会, 翻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13] 程恩富, 张建伟, 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 《经济学家》, 1999.3

[14] 李猛, 大学改革与学术传统,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2008

[15] 李猛, 现代社会中哲学思想的传播与教育, 访谈, 2009

[16] 陈方正, 传统文化未必制约科学进步, 新京报, 2010.6.30

[17] 郑永年, 中国知识体系建设的未来, 联合早报, 2011.9.27

[18] 荣格著, 徐德林译, 《荣格文集: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 (第 5 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4

[19] 牛实为, 《中国自然哲学基础丛书: 易经系统观》,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20] 牛实为, 《中国自然哲学基础丛书: 内经生态观》,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21] 牛实为, 《中国自然哲学基础丛书: 道德经自然观》,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22] 牛实为, 《中国自然哲学基础丛书: 华严经真空观》,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23] 牛实为, 《自性光明论》,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24] 马叔礼, 《大哉孔子: 解开易经千古之谜》, 台北: 策马入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1

[25] Johu Horgan, "Quantum Philosophy", *Scientific American*, 1992.7

- [26] Claude Swanson, "The Synchronized Universe: New Science of the Paranormal", Poseidia Press, Inc., 2003; Claude Swanson, "Life Force, the Scientific Basis: Volume 2 of the Synchronized Universe", Poseidia Press, Inc., 2009
- [27] I. Prigogine, "Laws of nature, probability and time symmetry breaking", *Physica A* 263, 528-539, 1999.
- [28] D. Bohm and B. J. Hiley, "The undi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 u. a. Routledge, 1993.
- [29] K. H. Pribram, "Brain and perception: holonomy and structure in figural processing",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
- [30] 海云继梦, 《华严经枢纽》, 空庭书苑, 2011
- [31] 张祥龙,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 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32] 陈焕章着, 宋明礼译, 《孔门理财学》,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 [33] C. Jones, "Frank Fenner sees no hope for humans," *The Australian*, 2010.6.16.
- [34] 谢宁, 《我在北京大学的三十年》, 2014